

有一位老人,她7次来到齐鲁晚报,每次捐出2万元现金,然后留下一个心愿,转身离去。没人知道她叫什么,她也从来不准记者拍照,虽然相识多时,我们只能称呼她为“天使老人”。

济南有位全国“绿色出行达人”,退休了,他还能从平阴县骑自行车到济南送稿子,再骑回去,而摩托车都撵不上他。他家里很富裕,可他就是喜欢环保低碳的生活。

本期策划 张洪波

这是一位神秘的老人,她来过齐鲁晚报7次,每次捐出2万元现金,一共14万元。每次她都说出一个心愿,留下一个约定,然后离去。

她没有告诉过我们姓名,也从来不准镜头对准她。记者除了知道她已年逾八旬,是一名退休医生外,别的则是一片空白。记者和被资助者们只能约定称呼她为“天使老人”。

“天使老人”第七次出现,是在8月30日上午,这次她又带来两万元现金,捐助舟曲受灾的孩子。

7次捐款14万,老人不留姓名,不让拍照

神秘的“天使老人”

本报记者 崔岩

“以后只要凑够两万元,我还来”

2008年11月25日,一个很冷的清晨。

山东新闻大厦员工通道处,齐鲁晚报机动新闻中心主编王立龄见到一位神秘老人。

“一位很普通的老太太,说是要捐钱,在楼底下焦急地徘徊。”虽是第一次见面,但老人那种很着急很执著的眼神,让王立龄至今难忘。

银灰色的头发,戴着眼镜,很是慈祥,穿一件蓝色的羽绒服,有些旧。鞋,也是那种很普通的灰色棉鞋。这是老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。

“报社是不能随便收钱的,哪怕是捐款,等有机会吧。”把老人请到办公室,王立龄把报社的规矩跟老人讲完,她却一脸着急,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我相信你们报社,一定帮帮我。我都这把年纪了,再等等……”老人的真诚、善良让人很难拒绝,王立龄只能答应暂时保管这笔钱,老人这才擦干了眼泪。从随身一个布包里,老人掏出两个一次性白色塑料袋。这种布包年纪大的人都见过,蓝色的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流行,但现在已经见不到了。

两个塑料袋里,是一沓沓的百元钞。“这是两万块钱,一沓1000块,你数数。”钱堆在面前,能闻到很浓的药品气味。

老人仿佛看穿了记者心思,“塑料袋是装药用的,我心脏不好,得吃药。”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。

王立龄请老人坐下,请她谈谈想把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。老人说:“我想把钱捐给乡村的老师,经济困难的,他们很不容易……”然后,她一股脑把钱塞进了记者手里。

“那我们怎么联系您,让您了解钱的去向?”记者问。老人说:“我相信你们,通过报纸联系就行了。”

这时,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进来,老人赶紧摆手,“不要这样,不要这样,我不想这样。”相机闪光灯闪了,老人突然转过身去,

“不要这样……”语音哽咽,老人又哭了。

“不要问我名字、电话,我只想通过你们把钱送到乡村教师的手里。”老人的举动触动了记者心中最柔弱的神经,尊重老人的意见或许就是对老人最好的报道了。

在本报盖章的收据上,老太太写下了“爱心捐款人”的落款。“以后只要凑够两万元钱,我还来。”临走时,老人留下了郑重的承诺。

水泥地,老家具,餐餐吃煎饼

帮助生活困难的乡村教师,本报帮老人实现了心愿。老人也没食言,短则俩月,长则四个多月,只要攒够了两万元,老人就会再次来到报社。从第四次来报社开始,那位神秘的老人,不知不觉已被称为“天使老人”了。

邱钊说:“她身体还好吗?临走想跟她说一声,一直没联系上。”如今已不在本报工作的邱钊,算得上是与老人接触最多的记者,与老人感情也最深。

从老人第一次来到报社,连续四次,都是他接待老人,他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去过老人家的记者。

“老人心脏不好,每次来报社都找不到地方,坐电梯,经常犯晕。她真是一个好人。”说起老人,邱钊一脸的心疼。

能去老人家,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。

2009年7月23日上午,老人第四次来报社,也许是彼此相熟了,送她下楼打车时,对于邱钊送她回家的坚持,她没有拒绝,只有唯一一个要求,保密。

邱钊说,虽然知道老人的住所,但他会尊重老人,按照之前的约定,除非老人同意,不会擅自公布她的住址。

老人一个人生活,十多年前,儿子和丈夫患病相继去世,如今仅剩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。“我现在这么做(捐款),既对得起死去的人,也对得起活着的人。”

房子是老房子,进门前,老人攥着邱钊的手说:“房子太简陋,你别见怪。”虽然做好了心理

准备,邱钊还是大吃一惊。

地面还是水泥地,家具也大多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,家里的摆设虽然简朴,但很整齐,很干净。

“都没坏,不舍得扔。”老人笑了,指着客厅里一个实木的方形桌子说:“这是我结婚那会儿,婆婆送的。”

老人低头,蓝色上衣下半截有明显的缝补痕迹,老人好几次都是穿这件衣服来报社的。察觉到记者的眼神,老人指指上衣,说:“女儿穿剩的,缝补了一样穿。”

另一间屋子里,桌子上晾了很多铺开的煎饼。“我习惯吃煎饼,一次买上3斤,放在家里慢慢吃。”老人吃饭很简单,午餐晚餐都是西红柿汤泡煎饼。

光吃煎饼?邱钊心里突然堵得难受,为老人心疼。“吃腻了也买几个大包子,天热我还吃雪糕呢。”老人安慰邱钊,这点在外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食物,到这里,却成了最奢侈的食物。

“抗日、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,困难时期,肚子都吃不饱。我们这一代人,吃过很多苦,受过很多难,能过现在的日子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只要我活着,我还会来”

很多人都知道这位“天使老人”的存在,但除了报社几名伙计外,很少有人见过老人。即使碰面,也未必知道她是谁。

2010年8月30日,老人第七次来报社,我却是第一次见到她。因为报社内部装修,部门临时搬到了13楼。

问了好多人,在电梯里转了好几圈,老人才被同事扶到办公室。“换人了?王主任没在?”老人有点局促。

扶老人坐下,要给她倒水,她抓着手不让,要给王立龄打电话,她更是不肯。“我坐一会儿等等,我来得不是时候,可别耽误你们工作。”老人有点不好意思,坐在沙发上很不安。

陪她聊了几天,老人讲的是自己的一些经历。出生于大户人家,念过私塾,去过洋学堂

书。一辈子过惯了苦日子,习惯了简朴,钱多也花不着,不如给有用的人。

捐出来的钱都是老人的退休金,每月发了钱,老人就把它取出来,一沓沓叠好,攒够了两万就送到报社来。“过几个月,天冷了,我还得来,到时候孩子该穿棉衣了。”老人已经惦记起了下次。

还是那个蓝色布袋,还是两个白色塑料袋,还是整整齐齐的20沓钞票,每沓1000元。“钱有点少了,但这是我的全部能力了。”王立龄来时,老人把钱递上去,老人这次想把钱捐给舟曲受灾的孩子。

找出上次为“山东哥哥”捐款的报纸,老人戴上眼镜,看得很认真。“对你们报纸,我很信任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临走,老人将报纸叠好,把“山东哥哥”隋刚送的字画,连同善款的收据,一同放进蓝色的老式布袋里。

“以后不在了,女儿整理遗物的时候,也让她知道钱是怎么花出去的,希望她像我一样做些善事……”

跟往常一样,对于自己的个人情况,她仍是三缄其口,姓名、联系电话、住址都不说。

送老人下楼,电梯里,老人紧紧抓住我的手,“心脏不好,坐电梯有点怕,不知道以后还能来几次。”

我要送老人回家,老人急了,“不用送,不用送,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。”在楼下,老人推开我,让我回办公室。公交车来了,老人赶紧上去。

“只要我活着,我还会来。”公交车启动,老人慢慢从我的视野消失……

过了几天,拿着老人的钱去银行汇款,自动存取款机里,哗哗哗,200张人民币,197张通过,退出三张。再存,三张全部过关。

用自动存取款机存过钱的人应该都知道,能有这么高的通过率,只能说明,这些钱叠得不是一般的规整。

背影(与文中人物无关)。
本报记者 王媛 摄

记者手记 死后才会 公开秘密

对于老人捐款这件事,虽然街头巷尾议论,报纸常在报道,可是老人的女儿,甚至邻居,至今不知道这个公众眼里的天使就是身边这位孱弱的老人。

对于隐瞒身份这件事,老人态度很坚决,“就等我死后吧,孩子如果整理遗物,或许会发现母亲的这个秘密。”

虽然没有光辉的色彩,但缺少了周围人的知情,老人的日子过得很平静。她可以随时上街走走,与邻居老头老太太拉拉家常。

时隔近两年,虽然我们不清楚老人姓甚名谁,但她却依然是我们眼中的那个天使。

链接 “天使老人”的 七次善举

从2008年11月25日到2010年8月30日,“天使老人”七次来到齐鲁晚报,共捐出14万元现金。她不留姓名,不留联系方式,也不让拍照,每次只是拿出2万元现金,说出一个心愿。

2008年11月25日,老人第一次到报社,拿出2万元帮助农村贫困老师。

2009年1月5日,老人捐善款两万元,希望帮助在济南打工的农民工。

2009年5月26日,老人第三次来报社。“儿童节快到了,我想帮帮农村的孩子们。”

2009年7月24日,“天使老人”第四次现身本报,给军烈属送关爱。

2009年12月21日,“天使老人”第五次到本报,资助农村残疾人。

2010年5月11日,“天使老人”第六次来报社,希望能帮助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学子。

2010年8月30日,“天使老人”第七次来报社,帮助舟曲受灾的孩子们。